



中国语言学文库

第三辑

基于梵汉对勘的
《法华经》语法研究

JIYU FANHANDUIKAN DE FAHUAJING YUFA YANJIU

姜南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

《中国语言学文库》第三辑

基于梵汉对勘的 《法华经》语法研究

姜 南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姜南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中国语言学文库. 第3辑)

ISBN 978-7-100-08396-6

I. ①基… II. ①姜… III. ①法华经—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B942.1 ②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522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ĪYÚ FÀNHÀNDUİKĀN DE FĀHUĀJĪNG YŪFĀ YÁNJIŪ

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

姜南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396-6

2011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 32.00 元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语言接触和汉译佛典语法比较研究：以梵汉对勘为基础》（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2005—2009，05JJD740177）的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汉译佛典对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价值	2
1.2 基于梵汉对勘的佛教汉语语法研究	8
1.3 以《法华经》为代表的佛典专书研究	19
第二章 佛经翻译中格范畴的系统对应	24
2.1 概述	24
2.2 宾格标记	27
2.3 具格标记	40
2.4 目的格标记	57
2.5 方位格标记	61
第三章 梵文原典动词变化之汉译	75
3.1 概述	75
3.2 时态表达式	76
3.3 体貌表达式	84
3.4 语态表达式	97
3.5 语气表达式	119
第四章 汉译佛经中的特殊句式	132
4.1 框式结构	132

2 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

4.2	同源宾语结构	152
4.3	“自然为+V”非宾格结构	157
4.4	特殊“是”字句——“S,N是”句式	161
第五章	复句与句法关联词	176
5.1	让步转折关系	176
5.2	假设关系	181
5.3	因果关系	189
5.4	并列及选择关系	194
第六章	篇章衔接策略	201
6.1	增译话题转移标记	201
6.2	呼格的凸显与转移	218
结语	226
缩略语及符号表	230
参考文献	233
附录:《法华经》1~10品梵汉对勘语料(节录)	244
专家评审意见 万金川	459
专家评审意见 洪波	465

第一章 绪论

汉译佛典对于汉语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它数量庞大、口语化程度高,能弥补同期(中古)中土传世文献在数量和质量(口语化程度)方面的不足,是中古汉语常规研究的必用语料;还表现在它作为汉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可考察的汉外语言接触的直接产物,是研究历史上汉语受到外来语言影响的宝贵资料。然而,作为翻译作品,汉译佛典的语言无论在词汇上还是在语法上都不同于一般的汉语文言著作,表现出了口语和书面语、汉语与原典语的双重混合,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语言个性。现阶段,只有先进行专门的研究,对其特殊性有了足够的认识,才有可能科学有效地利用好这份珍贵的语料。基于上述认识,本书选取汉译《法华经》进行基于梵汉对勘的专书语法研究。

《法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包括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和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是中古时期影响最大的两部汉译佛典。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厘清译文与原典在语法上的联系,揭示汉译《法华经》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译经语法与汉语语法发展的可能关系。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法华经》1~10品进行全面细致的梵汉对勘和同经异译的比较,从名词格范畴、动词时体范畴、特殊构式、复句与句法关联词以及篇章衔接策略等诸多层面展示汉译《法华经》语言的语法面貌;并在与中土重要传世文献的对比中发掘中古译经的语法特点,分析探源,厘清哪些成分是汉语固有的,哪些成分是从原典语言影响新产生的,新产生的成分是仅仅出现在

汉译佛典中,还是逐步融入汉语全民语的表达系统中。本书力图以系统、穷尽的专书语法研究揭开两部译经语言在语法上的特点,尤其是受到原典影响而形成的不同于汉语固有语法的特点,实践理想的、相对独立的佛教汉语语法研究。我们期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既能为佛教对汉语的影响这一“古老”的研究命题提供新的例证,同时也能为其他佛教汉语语法研究者提供一份“熟语料”,从而使中古汉语研究中对佛典语料的利用、使汉语史上由佛经翻译导致的语言接触研究以及中古汉语研究等等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

1.1 汉译佛典对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价值

1.1.1 汉译佛典作为汉语口语的宝藏和对同期中土传世文献不足的重要补充,是进行中古汉语常规研究的必用语料。

吕叔湘(1985)曾明确指出研究各个时期汉语本质特征的根据当为白话资料,也就是“反映口语的书面语材料”。然而中古时期中土文献中以口语为主的“白话”篇章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中古译出的汉文佛典则数量庞大,并且以方便向汉地普通民众传播佛教的教义教理为主要目的,注重译文的通俗性,富含流行于当时汉语共同语和方言中的口语俗语成分,比同期其他汉语文献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汉语口语的真实面貌,所以,作为中古汉语白话资料的典型代表。汉译佛典理应成为汉语史研究的理想语料。

朱庆之、朱冠明(2006)在《佛典与汉语语法研究》一文中详细评介了20世纪以来有关汉译佛典语法的研究情况。概括而言,汉译佛典材料从1980年代以前的重视不足到1980年代以后的关注度逐步提升,以至“有关的论著中征引佛典语料已成为通例”(见方一新1999),汉译

佛典被大量用于汉语史研究中,成绩有目共睹,不仅有力推进了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也成为汉语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如文中所述:

王力是目前所见最早利用佛典语料研究历史语法的国内学者。他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937)一文中曾引用《四十二章经》和《阿弥陀经》各 2 例。

吕叔湘也较早把目光投向了汉译佛典。他在 1940 年代进行的一系列近代汉语研究中(吕叔湘 1999),除了以禅宗语录为主要材料外,还利用了中古佛典的例证,如在《说汉语第三身代词》(1940)、《论毋与勿》(1941)中引用了《百喻经》,又在《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1943)引用了《佛本行集经》。

张永言也是国内较早注意到佛典语料价值并加以利用的学者。他在 1960 年代初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张永言 1999),便重视并广泛征引了佛典语料,其中包括对“会”“会当”“为当”“尔许”“能这样、如此”“着”“几多”等虚词早期用例的探寻。

稍有遗憾的是,系统而大规模利用汉译佛典语料来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日本的太田辰夫。他在《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1987)的“跋”中专门讲到了研究的资料问题,明确指出唐以前的研究“译经应该进一步大量使用”。书后“引用书目”共列有隋以前译经 30 部,唐代译经 2 部。在很多语法问题上作者都有意识地引用了汉译佛典材料作为证据,比如助词“着”、被动式、重叠式、接头/尾辞等等。太田先生对汉译佛典重要性的强调,以及他在研究中的具体实践,为这部日后成为汉语语法史经典的大作增色不少。

许理和(1977/1987)继太田辰夫之后,再一次从语言学的角度强调了中古汉译佛典的重要性,认为在当时“东汉佛经译文这种宝贵的语言资料还没有引起语言学家们的普遍重视”。他对自己考订出的 29 部“可靠的”东汉佛经中包含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许认为反映了当时的

口语)进行了颇具方法论意义的分析,比如词的构成、动词补语、代词系统等等,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可信的。

进入19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汉语史研究者开始关注汉译佛典语料,并积极加以利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进一步显示了汉译佛典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许多中古汉语新兴的语法现象都能在汉译佛典中找到更加丰富的例证,得到更加完整的体现。

汉语史上判断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系词“是”的来源以及它产生的时间、产生的机制、成熟使用的时间等问题上。汉译佛典中系词“是”的使用,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用法上,都比同期中土文献丰富,为上述问题的进一步厘清提供了重要条件。如唐钰明(1992)证明系词“是”在东汉已经“走向成熟”的四点理由均依赖佛典用例的支持。而且作为一条过硬的检验标准,陈秀兰(1997)、汪维辉(1998)都曾在东汉佛典中找到4处“不是”的用例。

汉语被动式的研究也与汉译佛典关系密切。中古时期是现代汉语最常用的“被”字句形成的重要阶段,吴金华(1983)、唐钰明(1987、1991、1993)的统计证明汉译佛典中被动句及“被”字句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中土文献,这无疑为考察“被”字句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大量的语言事实。

动态助词“了”“着”和结构助词“底”的最终形成是近代汉语中的事,但它们的源头都要追溯到中古,大量用例则来自汉译佛典。如梅祖麟(1981)最早把“了”的来源与南北朝的完成动词“竟、讫、已、毕”联系起来,指出“动+宾+完成动词”是“了”语法化的最初句法环境,而这一结构在中古佛典中最为常见。蒋绍愚(2001)进一步对比了“已、竟、讫、毕”在佛典与中土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指出“已”与“竟、讫、毕”性质有异,佛典中用于瞬间动词后的“已”才是完成貌词尾“了”的前身。

其他还有大量溯源中古的语法现象都有赖于佛典用例的支持。

第二,汉译佛典语言本身具有独特的语法表现,不同于地道的中土汉语,但与汉语语法的发展关系密切。

四字格的强势使用造成佛典中的双音成分激增,加剧了中古汉语双音化的趋势。志村良志(1984/1995)最早在汉语双音化的背景下考虑使成复合词的形成,认为在中古复音节词激增的时期内,某些词有可能越过并列连用的阶段而使成复合动词化,他所列举的二百多个复音动词中,大部分来自佛典。朱庆之(2003)更清楚地阐明了动补结构的产生受到了佛典翻译的影响:佛典中经常会用“同义连文”将单音词双音化或多音化,但译师有时会误用一些不是真正同义的词汇,这样便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双音动词——“准补充式”,如“拔断、充满”等,而这些“准补充式”可能正是动补结构的重要来源。

许理和(1977)、太田辰夫(1988)、魏培泉(1997)、曹广顺、遇笑容(2000)等研究指出,中古最常见的两种处置式“取”字句和“持”字句都是在译经中产生且主要在译经中使用,中土文献里用例稀少。

梅祖麟(1978)、朱庆之(1990a)、何亚南(2001)等注意到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前身“为……为……”式最早见于汉译佛经。

其他如魏培泉(2002)对佛典比拟式的研究,遇笑容、曹广顺(2002)对中古特殊疑问句的研究,等等。

可见,汉译佛典不仅可为溯源中古的语法现象提供丰富可靠的例证,还与汉语语法的发展关系密切,涉及汉语语法史许多重要方面的问题,是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及中古汉语研究的必用材料。

1.1.2 汉译佛典作为汉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可考察的汉外语言接触的直接产物,还是研究古代中印语言接触及其对汉语发展产生影响的珍贵资料。

由于目前有关汉译佛典语法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汉译佛典语料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的价值远远未被发掘出来。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利用佛典语料研究汉语语法史中的传统问题上,研究中多将佛典语料与一般中土文献混为一谈,没有充分认识汉译佛典语言的本质特征。

日本学者辛嶋静志(1997)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往单纯从中国学角度的研究有其缺陷。这些研究总的来说有两类:一是收集用例,归纳性地阐明意思;二是停留在自始至终与外典(佛典以外的中土文献)中相类似的用法的比较,没有表明汉译佛典的特征,即汉译佛典是“翻译”。台湾学者万金川(2005)用“良药苦口”来形容辛嶋的批评。大陆学者作为当前汉译佛典语言研究的主力军,一方面虚心接受,一方面也在加深对汉译佛典语言的本质特征认识的同时,着力寻求适合的角度和方法展开新的研究。朱庆之(2001)就认为,过去研究佛教文献语言的角度和方法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过分夸大了汉译佛经的口语化程度,那些在同期中土文献中不经见的语言成分和现象往往被认为是口语或方言的成分,企图从更早的中土文献中寻找来源,而忽略了佛教文献与原典的关系。在其看来,汉译佛典语言是一种与其他中土文献语言有明显差别的“佛教混合汉语(Buddhist Hybrid Chinese)”,表现在它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混合体——“一是汉语与大量原典语言成分的混合,二是汉语文言文与大量口语俗语和不规范成分的混合”。也就是说,汉译佛典语言作为汉语历史文献语言的独特变体,具有明显的混合特点,其中汉语与大量原典语言成分的混合实际上是语言接触的产物。

现代语言学理论已经证实,语言接触是导致语言演变的重要原因。在汉语的发生与发展史上,汉语与外族语言的接触从未中断过,既有由人员直接交流形成的自然语言接触,也有通过文字传播或文献翻译等间接途径进行的非自然语言接触。汉语史大量研究证明,汉魏六朝是

汉语孕育巨变的关键时期。而此时正是汉语史上汉外语言接触异常频繁的时期,因此,在讨论中古汉语为何发生如此变化的时候,语言接触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汉末魏晋以来,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汉语自然要与其他语言发生程度不同的直接语言接触,导致汉语的某些变化。此外,从东汉开始,印度佛教正式传入,作为重要的传播手段,中外僧人进行了大规模的佛经汉译活动,仅从东汉到隋这一段,就翻译了 1482 部、5702 卷共计 4600 万字的经典(朱庆之 2001)。这些经典的原文大部分由梵语等印度古代语言写成,是非常典型的屈折语,将其转换成典型孤立语的汉语,不但在古代中国文化史上,在世界古代文化史上都堪称奇观。直接参与佛经汉译的人虽然不多,但是翻译作为间接方式的语言接触,持续近千年,这无疑奠定了汉语与梵语等外族语言充分接触的良好基础。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随着佛教对中国的“征服”,作为佛教教义的承载者,汉译佛经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包含了大量原典成分的汉译佛经语言势必会对中国民众的语言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语言接触理论以及历史上语言接触对汉语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汉译佛典作为汉语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欧化,即古代印度语言和文化对汉语和汉文化深刻影响的直接产物,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有助于揭示中古时期受佛经翻译影响的汉语语法演变的面貌和机制,从而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找到更为全面合理的解释。

总之,汉译佛典以其量的优势和质的特色,对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具有多重价值:不仅是中古汉语研究的理想语料,而且是语言接触研究的范例样本,语言对比研究的绝佳舞台,具备验证现有语言理论、酝酿新生语言理论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译佛典更应受到汉语史研

研究者的重视,进而从全新的视角展开专门的研究,充分发挥它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为揭示中古时期汉语演变的真相、丰富历史语言学理论以及语言接触理论做出积极的贡献。

1.2 基于梵汉对勘的佛教汉语语法研究

基于梵汉对勘的佛教汉语语法研究是迄今为止比较理想的佛教汉语研究,即通过汉译与原文的语言比较,厘清两者在语法上的联系,揭示汉译佛经中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与性质,在此基础上探讨译经语法与汉语语法发展的可能关系。

1.2.1 梵汉对勘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汉译佛典语言的独特性质自然需要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那就是梵汉对勘,包括梵汉对勘材料和方法的运用。

汉译佛典作为翻译作品,其语言无论在词汇上,还是在语法上,都混杂着外来的、非汉语的成分,或者说原典语言在词汇、语法上异于汉语的成分被披上汉语的外衣移植到译经中来。这些外来成分无疑是汉译佛典语言中最有特点的东西。要将它们从译经语言中剥离出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梵汉对勘(见朱庆之、朱冠明 2006)。把某一部汉译佛典的词汇、语法与以梵文为主的原典语言相比较,厘清哪些成分是汉语固有的,哪些是原典的渗入或者受到原典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唯有如此,才能揭开佛教汉语的真实面貌,正确把握汉译佛典与梵文原典、与汉语全民语的关系,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探究佛经翻译影响下汉语的发展轨迹与演变机制。

梵汉对勘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很早就被用于佛教学、印度学及文献校勘领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词典、索引等具有较高学术利用价

值的工具书不断编制问世,嘉惠学界。近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大力倡导下,才开始将梵汉对勘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用于佛典语言研究。

朱庆之(1990b、1991、1994、1998)较早将梵汉对勘方法和对勘材料用于汉译佛典语言研究,并初见成效。例如利用梵文平行词考订出《世说新语》“将无同”一语中语气副词“将无”的准确含义和可能来源,辨明佛典中频率副词“时/时时”经常表达“几乎不”的意义,等等,初步显示了梵汉对勘方法和材料的价值。

台湾学者万金川(2001、2003)强调汉译佛典语言的研究者应该具备一些原典语言的知识,不然会造成误读或误解。

日本的辛嶋静志虽然是佛教文献学者,也曾多次阐述梵汉对勘在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性(1997、1998)。他倾力编纂的两部词典,《正法华经词典》(1998)和《妙法莲华经词典》(2001),分别收集了见于《正法华经》和《妙法莲华经》的大量佛教用语、音译词和口语词,这些词语要么没有被历来汉语词典或语法书收录,要么即使收了,也是以西晋后的文献作为依据。词典将这些词按音序排列,并附上梵文本(Kern-Najio校勘本及中亚出土写本)、异译本的对应词以及英文翻译。两部词典描写全面细致,对汉语史角度的佛教汉语词汇、音韵乃至语法研究都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曹广顺、遇笑容(2000)较早地把梵汉对勘运用到汉语历史句法研究中,考察了处置式中可能受到的外来影响。蒋绍愚(2001)发现了汉语动态助词“了”的前身是佛典中用于瞬间动词后的“已”,而“已”之所以能在佛典中产生新的语法功能,主要源于对梵文“绝对分词”的对译。朱冠明、段晴(2005)也利用梵汉对勘方法,挖掘出佛典中一些可能受外来影响的特殊语法形式。

与词汇的直观、敏感、易变的特征相比,语法涉及一个语言的深层组织规则,具有高度的稳固性和隐秘性,变化不易察觉。如果离开系统

的梵汉对勘,不仅难以探明许多佛典中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而且挖掘不出更多佛教汉语不同于中土汉语的隐性语法差异,进而限制佛教汉语和语言接触研究的深入展开。此外,对勘还有助于发掘梵汉两种语言各自不同的组织原则,展现佛经翻译如何跨越两类语言表层形式的差异、达到深层语义的对应。

根据目前实际,梵汉对勘也已经成为一套切实可行的佛教汉语研究方法。

虽然许多印度佛典到达中国以前,经历了复杂的文本变更及翻译转换过程,导致了一个非常混杂和分层的文本^①。汉译佛经的原典除了梵语佛典外,还流传着阿耆尼语(吐火罗语 A)、龟兹语(吐火罗语 B)、于阗语、粟特语、维吾尔语、西夏语、蒙古语、满洲语等各种佛典。但是它们大多数只有片断,或是转译、重译,对研究很难有用处。因此,最早而且以比较有条理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梵语佛典负有重大使命,是推进研究的支柱(见山田龙城 1988)。

19 世纪以来,大批佛典梵文写本问世,国际上随即掀起了校勘整理的热潮,学者们也据此比定出许多与现存汉译佛经同源的梵文原典,为进一步开展梵汉对勘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就《法华经》而言,该经的核心部分形成于公元前 1 世纪,嗣后长期流传印度、中亚各地。据史料记载,该经传入中土后,凡经八译,最早为三国吴·支谦节译的《佛以三车唤经》一卷,今已亡佚。现存完整的汉译本共有三种,按时代先后分别为:

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10 卷 27 品,286 年译出。收录于 T9, No. 263。

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7 卷 28 品,406 年译出。收录于 T9, No. 262。

隋·阇那崛多共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8 卷 27 品,601 年

译出。收录于 T9, No. 264。

其中《添品妙法莲华经》是对鸠摩罗什译本的重新校订,除了结构有所变动,略微增加一些内容外,跟《妙法莲华经》没有太大不同。所以学者们更多关注 3 世纪译出的竺法护本和 5 世纪译出的鸠摩罗什本。

《添品妙法莲华经·序》中保留了该经援用底本的最早记载:“昔敦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验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检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大正藏》T9/134c)即认为竺法护译本似译自梵文,鸠摩罗什译本则可能转译自龟兹文译本。

由于两部佛经汉译之初的底本早已亡佚,现存的龟兹文本又残缺不全(见山田龙城 1988),所以我们不可能拿它们的原始底本来做对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比研究无从入手。因为在迄今发现的梵语佛典写本中,《法华经》的数量非常多,达四十余种,主要来自尼泊尔、克什米尔、中国新疆和西藏等地。学者们习惯上将这些写本划归三类两大体系。三类为:(I)尼泊尔写本;(II)吉尔吉特写本;(III)中亚写本(又称新疆写本或喀什写本)。

I. 尼泊尔写本 写本数量有四种说法:39 个(汤山明)、45 个(克劳斯·伏葛尔)、36 个(冢本启祥、久留宫圆秀)、33 个(蒋忠新)。包括贝叶本和纸本。书写年代为 11—19 世纪。西藏发现的梵文《妙法莲华经》是从尼泊尔传人的贝叶本,也写于 11 世纪。这些写本是迄今所见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法华经》梵文写本。

II. 吉尔吉特写本 书写材料为桦树皮。大部分被零星卖掉,残缺不全。书写年代为 6—8 世纪。

III. 中亚写本 都是纸本。书写年代为 7—8 世纪。

经过半个世纪以上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已有多种精校梵本陆续